

序二

張鐵志*

「過去二十五年台灣民主代表的意義到底何在？」

這是莊雅仲在這本《民主台灣》的核心關懷，也是華人社會許多關懷民主的人的共同問題。

在台灣外面的人，看著台灣不斷上演政治荒謬劇，質疑台灣民主的意義；在台灣裡面的人，也未必清楚這個巨大歷史轉型的真正成就與限制。

民主化的確可能比威權時期暴露出更多社會矛盾：因為一切都被公開，都可以進入政治場域辯論、鬥爭。

在台灣亦是如此。在經歷「分期付款式」的漫長民主過程後，許多長期被壓抑或者新產生的困頓與黑暗也一一浮現。

一、在1992年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直選總統、2000年政黨輪替後，台灣看似建立起了基本的形式民主架構，但這不是民主的終點——民主還有賴公民在不同公共層次的政治參與，從社區、到社會以及政治領域。幾乎是與台灣的民主轉型同步，社區運動也從1980年代末開始，試圖改造地方社區的政治實踐，打造社區公共意識。此外在2000

* 台灣政治評論人，香港《號外》雜誌主編。

年之後，也有學者和政府機構推動審議式民主，以補充代議民主的投票制之不足。

二、台灣的民主化後，公民社會雖然被解放，但仍有許多侷限。如社運團體在資源和經費上十分困窘，且在政黨輪替後，部分社運團體的能量被民進黨政府吸納，讓政治與社運關係重新經歷一段摸索期，直到這幾年才見社運風雲再起。

又如公民社會中很重要的媒體，在威權崩解之後，卻沒有能成為真正的公共領域——作為一個價值與政策辯論、思想與重要資訊傳播的場域，反而迅速地黨派化、八卦化、瑣碎化，讓消費主義邏輯徹底掩蓋了公共邏輯。

三、原本人們期待民主化會帶來更多社會平等，因為民主會壯大(empower)中下層階級，讓他們組織起來，或者透過選票制定更公平的財經與稅制政策。但台灣的現實是，民主化也讓資本家更有力量，更能影響立法和行政機構；且當作為中介的政治制度(如選舉制度、政治獻金規範)更有利於資本家時，民主化後的社會不平等也因而更為嚴重。

四、本土化和民主化本來可以互為進步動力。尤其在台灣的歷史環境下，一個移入政權不僅在政治文化資源上有嚴重的省籍不平等，在國家體制上也缺乏本土正當性(如萬年國會)。而在1990年代之前，這些本土化訴求，無論是強調族群平等或是住民自決，都相當有進步性，而非一種排他性的族群主義。

但民族主義是一種巨大的誘惑，掌權者一方面可能以族群認同來進行容易的政治動員，另一方面則可能以認同政治來壓制民主，以團結或「人民」之名打壓異議。最嚴重的魔鬼時刻在2006年陳水扁第二任期，因為要化解貪腐危機，所以強烈動員族群情感來取代反省並打擊黨內異議，導致一批學者發表「七一五宣言」，強調「以民主豐富台灣認同」，要求陳水扁下台。

以上這些台灣民主時代所面臨的各種議題：本土、族群、社會運動、社會福利、社區、媒體，幾乎都在莊雅仲這本書被討論到。尤其

雅仲不像政治社會學者主要探討宏觀的結構和制度，而是作為一個人類學者，採取他所謂的「民主人類學」，從民眾生活和社會關係進入，從「民主化作為個人或群體的長期的智識探索與行動實踐」進入，以對更大的民主過程探射出新的洞見與理論反思。

民主從來就是一個不會停止的計畫，是一個不斷抗爭，不斷前進的過程。希望這本書帶給台灣與島嶼之外的讀者對台灣民主有更細膩的認識與反思，以讓我們繼續努力朝向彼岸的民主實踐。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資料